

安徽文史集萃丛书之六

安徽史踪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

●安徽文史集萃丛书之六●

文教史踪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7年合肥

封面题签 张恺帆
封底篆刻 郑家琪
特约编辑 余乃蕴
汤德用
陈金沙
封面设计 马世云

文 教 史 踪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625 字数：220,000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7-212-00005-1/K·4 印数：1—24,000

统一书号：11102·92 定价：1.80元

前 言

《文教史踪》随着它的九个姊妹篇一起，奉献给读者。由于编者学识有限，在《文史集萃》这个“大家族”中，它还不那么成熟。我们这个卖瓜儿的，不敢说这瓜儿怎么甜，只是诚心诚意地请读者“品尝”一下，作出自己的判断。

据说，当前有些人特别是有些青年人，不喜后顾，只喜前瞻，常作横的比较，不大作纵的分析。就有这么一句比较流行的话：现在是八十年代了，还拣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干嘛！但是，历史是一个不可割断的链条，昨天——今天——明天，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且看——

在安徽漫长的教育发展史上，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清末安徽教育概述》、《皖西苏区文化教育》、《抗战前合肥城区的私塾》等等。当我们欣看那满园桃李，倾吐着芬芳的时候，很自然想到那些辛勤的园丁。《胡晋接对徽州教育事业的贡献》、《周馥两代后裔办学始末记》、《我所知道的樊映川教授》，以及我省知名的老教育家吴汝纶、张子开、童茂倩先生事迹片断就是其中之一。《她们首办女学》，写了三位女教育家。其中一位是繁昌县的“时运不齐，命途多舛”的寡妇张世英，含辛茹苦，在本世纪初叶办起了“肇兴女子学校”，几经奋斗，颇具规模。她临终前留下了这样遗嘱：今后谁继承办学，我的家产就归谁，其他人不能争夺。还有一位是冲破封建束缚，变卖陪嫁的田产，办起了“启秀女子中学”的宿县周静斋女士。她最后贫困交加，生计维艰，死在她女儿家中。读罢这些史料，不禁想到，这不是鲁迅先生当年称赞的中华民族的脊梁么？！是的。他们和千千万万个“无名氏”的教育家，都是中华民族教育战线上的脊梁！一代又

一代，一年又一年，耕耘开拓，继往开来。他们的业绩，是安徽教育史册的一页，也是那漫长历史链条的一节。

在《报海拾穗》中，记录了我省自清末到解放前的新闻界活动片断。我们看到，老一代报人的煮字烹文，播火传薪；也看到了时代的风云，在摇曳着他们编辑部的灯火……

在《文坛轶事》中，有鲜为人知的左联与安徽左翼文化运动的史料，还有《“未名社”的安徽成员》，当代著名作家、“未名社”成员、霍邱人氏李霁野教授，以亲见亲历亲闻的翔实史料，娓娓道来，亲切朴实，读罢掩卷，如坐春风。

人们爱听黄梅戏、庐剧、泗州戏等，但不一定都熟悉这些地方戏的发展历程，以及它们各自艺术风格的形成。在这里，我们奉献给读者《黄梅戏从农村唱到城市》、《庐剧的沿革与发展》、《泗州戏的足迹》，还有《严凤英小传》、《丁玉兰与庐剧》等，有助于人们在这方面的艺术考察与研究。就黄梅戏来说吧，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民间的采茶调、高腔、昆曲、评剧对它的艺术影响，他们勇于吸收，更精于消化。也可以看到从当年点着香油灯在农村演出，到以后唱到安庆、上海、北京，走上银幕，飞往海外的历程。泗州戏的发展也是这样，从“跑坡子”到拉魂腔，直到形成完整的泗州戏艺术，已约二百年的历史了。几经风霜，几番琢磨，几度春秋，艺术家们的锲而不舍的创造，中华民族丰富艺术遗产的哺育，对黄梅戏、庐剧、泗州戏等的艺术风格的形成，是多么息息相关啊！昨天——今天——明天，这个不可割断的历史链条，在这儿不也是拧得挺紧么！

由此不禁想起了前些时候漂流万里长江的王殿明，他过金沙江，闯虎跳峡，出白鹤滩，抵达上海，行程六千多公里，也是一种“上下而求索”吧。同时，也想到了发源于青海卡日曲的黄河，它蜿蜒曲折，穿过绿色草滩，奔向东北，直赴星宿海和约大宗列曲汇合。啊，那“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滔滔大河，在它的源头却是涓涓细流……

当我们思索这一切的时候，鲁迅先生这样一句名言，立刻跳上了心头：“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

编 者

1987年3月

目 录

前 言	编 者(1)
-----	--------

教 育 沿 革

清末安徽教育概述	张耀宗 章覲华(1)
皖西苏区文化教育	顾 旭(10)
抗战前合肥城区的私塾	董光升(17)
回忆抗战时期的安徽流亡教育	朱伯健(20)
解放前安庆教育发展概况	金杏村等(26)

名 校 史 录

安徽省立第四中学概述	邹思雨(41)
蚌埠最早的工人子弟小学——勤民小学	季文禄(47)
黄麓师范学校简介	王德培等(55)
淮北建设中学见闻录	萧县政协(62)

教 坛 耆 宿

胡晋接对徽州教育事业的贡献	颜 永(69)
她们首办女学(三篇)	张雅清等(76)
周馥两代后裔办学始末记	廖承义 张传忠(79)
吴汝纶先生轶闻	何晓履(84)
我所知道的樊映川教授	唐德纯(87)

披荆斩棘开拓教育的长者.....邓竹如等(91)

报 海 拾 穗

清末至解放前安庆新闻报纸概述.....胡真等(95)

芜湖报业简史.....张孝康(99)

芜湖最早的近代报刊初探.....汪兴泉(109)

解放前屯溪的新闻界.....汪则之(114)

抗战初期阜阳的进步刊物.....梁义三(127)

文 坛 轶 事

三十年代的安徽左翼文总和左联

——兼记叶以群同志刘芳松(131)

左联安徽分盟与《百灵》月刊班志洲(136)

“未名社”的安徽成员李霁野(142)

回忆安徽省立图书馆蒋元卿(147)

三、四十年代安徽新文艺运动片断何 鹏(157)

艺 坛 岁 月

严凤英小传王冠亚(163)

丁玉兰与庐剧王国光(175)

远听一台戏，近看一支箫

——记洞箫艺人张魁明流 涛(183)

丹青寄语话三人雨辰等(185)

深切怀念舒绣文大姐余宜巧(191)

棋坛风云 人世沧桑过旭初(196)

戏 曲 园 地

- 回忆安徽抗战时期的话剧活动 李培仁(204)
黄梅戏从农村唱到城市 洪 非(211)
庐剧的沿革与发展 辛 人 诗 珠(225)
皖南花鼓发新声 蔡义莲口述 徐维谦整理(229)
泗州戏的足迹 完颜艺舟(234)
宿松的文南词与丝弦锣鼓 陶 演(249)

历 史 人 物

- 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和胡适 沈 寂(253)

清末安徽教育概述

张耀宗 章覲华

安徽兴办学校，是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设立求是学堂开始的，从这以后直到1911年(宣统三年)，可以说是安徽学校教育的草创时期。现就其大概情况作如下分述。

(一)学校教育的兴起和发展

随着时势的变化和发展，科举讲习所式的书院越来越不能适应需要，皖抚邓华熙迫于形势，锐意改革教育。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邓抚在呈请开办学堂的奏札中说：“熟权时势，今之宜讲求西学，以造就人才。”其具体的理由，一是旧有的书院担不起发展西学的重责；二是京、津、沪已有头等学堂，要保证它们的学生来源，各省宜办二等学堂；三是要改变当时对于西学的敷衍不实之风，必须实事求是，以使教育能够切实。他在奏札上还拟定学堂名为“求是学堂”，并强调学堂既重西学的学习，尤重圣贤义理的熏陶。这很合清政府的意旨，所以他得到了“与泛言设学者有别，自应准如所请”的批复。次年，安徽求是学堂便于省会安庆正式开办，招收了正课生67名，附课生26名，这就是安徽省有学校以来的第一批学生。尔后在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潜山县设置官立高等小学堂，又首开安徽小学教育之端。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西太后宣布实施所谓“新政”，谕令各省改书院为学堂；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又将《钦定学堂章程》颁布全国，通飭各省广设学堂；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8

月，清室慑于各方压力，“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在这种形势下，安徽的新教育开始有所发展，学堂数量逐年有所增加。1902年春产生了安徽最早的一批中学，即桐城吴汝纶倡办的桐城中学堂、合肥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创办的庐州中学堂、舒城县令万祖恕设立的斌农中学堂和陈仲甫(陈独秀)等创立的尚志学堂。据现有资料统计，全省的学堂，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有13所；1904年有41所；1905年有80所；1906年有198所；1907年有293所；1908年有503所；1909年(宣统元年)有723所。7年之间，平均每年几乎增加100多所。按照学堂的类别，1909年的723所学堂中有专门学堂7所、实业学堂7所、初级师范8所、师范讲习所9所、中学堂25所、两等小学147所、高等小学74所、半日学校13所、女子学堂16所、蒙养院(幼儿园)8所。由于那时的学堂处于初创阶段，在校学生人数不多。据1908年统计，全省23所中学堂，学生人数最多的是颍州府立中学堂，为133人，学生人数最少的是广德州立中学堂，为15人，平均每校约67人，总共1548人。而且，那个时期的学堂，大都集中于省会、府城及较大的商埠，以省会安庆为最多。广大农村则私塾林立，几乎每村都有。除此而外，还有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产物——教会学校。自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到1910年(宣统二年)，计有安庆的圣保罗学堂和培德女学堂、芜湖的圣雅各学堂和萃文学堂、合肥的三育学堂以及怀远的淮西学堂等中学堂，还有求道、天恩等小学，主要是传习教义和经义，进行奴化教育。

安徽的中等专业教育在这个时期也有所草创，在专门学堂中，法政学堂居于重要地位。1906年就课吏馆改设的省立安徽法政学堂就是一所培养官僚和律师的干部学校。该堂开始以“造就已仕人才”为目的，后经两次扩充，编设豫、正、别及讲习、简易五科，学生达到500余人，分官班、绅班两种。另设夜班简易科，以便省城在职要员们学习提高。以徐锡麟为监督的高等巡警学堂是一所公安干部学校。该堂开办于1906年，开始只有本省绅

班学生87人，后添客籍绅班10人，复招候补官班学生50人。1907年7月，徐锡麟击毙巡抚恩铭，率领巡警学堂学生进攻军械局，起义失败被捕后英勇就义，该堂也随之停办。开安徽师范教育之先河的，是1905年成立的徽州府官立师范学堂，它是就著名的紫阳书院改建的，属于简易性质，学生多是贫寒塾师。继之，则有安徽高等学堂附设的师范班及安徽师范学堂和安徽全省公立女子师范学堂等。安徽师范学堂(后为优级师范学堂)成立于1906年2月，第一届学生有272名，分为6班，3班为初级简易科，3班为优级选科预备班，于1908年同时毕业。简易科诸生陆续派往原地充任小学教员，预备班诸生进入选科继续深造。在实业教育方面，最早创办的是颍州府立蚕桑学堂(1907年)，其次就是桐城私立工业传习所和安徽官立中等实业学堂(1908年)。工业传习所传授的是简单的化学工业技术，学生仅能制造洋蜡烛及各种肥皂。中等实业学堂是一所规模较大的学校，为藩宪沈曾植所办。堂内设有工、农、商3科，每科学额200人，共有学生600人，分预科、本科教授，这所学校在当时为培养中等专业人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安徽的留学教育，始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分官费、私费两种。开始都是留学日本，首批赴日的留学生是方时简、潘赞化两人，然后逐年有所增加，到1908年共有留日学生77人。1908年2月，安徽开始向欧美派遣留学生，第一批有丁绪贤、鲍璞等12人，往后留美学生逐渐增加。1909年，安徽提学使司在省内举行第一次留美考试，选送了10名留美学生。

当时安徽许多先进人物推动着新教育发展，桐城的吴汝纶就是其中的一位。汝纶先生学博识卓，曾任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后赴日考察教育，更感教育乃富国强兵之要素，所以他一归国，立即回到安庆倡办桐城中学堂。吴先生于1903年病故以后，桐城中学堂从安庆迁回桐城县城，重建校舍扩充兴办，对于桐城教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学校教育的宗旨和学制

安徽在这一时期的各级各类学堂，奉行的是清王朝规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通行的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的“癸卯学制”。但在学制方面，安徽的实际情形又有所变动：第一、增加了半日学堂、识字学塾、法政讲习所、法政简易科、自治班、初级师范选科、师范讲习所、保姆讲习所等学堂；第二、“癸卯学制”规定高小毕业才能升入中等实业学堂预科，而在安徽可以升入本科，只有初小毕业的学生才进预科，如官立中等实业学堂就是这样做的；第三、“癸卯学制”规定中学毕业只能升入高等学堂预科，而在安徽，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进入本科，未毕业的才进预科。至于各学堂的修业年限，基本上是按照“癸卯学制”执行的，但也略有不同。安徽高等学堂创办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是当时安徽的最高学府。按照定章，该堂的学生应从中学毕业生中考选，但在开办之初，没有中学毕业学生，只得选录前在大学堂肄业的学生和具有中国经史文学根底的士人入学。这样，学生的“学年学资势难一律”，故班次之编定、学科之教授，数经变动，没有定规。1906年，福建学者严复到堂担任监督。他针对上述现象，将学生一律改为预科，并“择其年龄较长或在堂已久或程度较深者别为一班，补习中学各科，期以一年毕业”；又因师范教育未兴，于补习班加授教育诸学。次年复于预科中挑选师范一班。直到1909年，该堂才开办本科一班，学生只有12人，另有预科四班，学生共计214人。本科传授高等学堂学科，预科学习中学高年级课程。

当时，清政府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主张。安徽各学堂均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初等小学堂招收7岁以上儿童，开设的课程有必修科8门：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历

史、地理、格致、体操；随意(选修)科有图画、手工两门。高等小学堂招收初等小学毕业生，所设课程同初小基本相同，只是必修科加上了图画为9门，随意科除手工外，还有商业、农业等科目。中学堂“为高等专门之始基”，以作官、从事实业和升学的准备作为办学的宗旨，所开课程为12门：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术、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可以不开)、图画、体操。1910年，中学堂实行文、实分科制，文科重经学，实科重工艺。师范教育、实业教育等也有各自的办学宗旨和教授科目。以上所述，都是清政府的定章，安徽实行的实际情况不完全相同。例如，安徽中学堂自1903年起，一般只开设10门课程，个别的(如庐州中学堂)也只设11门。而且，从1905至1908年，全省中学堂缺体操、图画两门课的是普遍现象，缺博物和理化两门课的也为数不少。又如，安徽的中学堂乃至高等小学堂，学生的来源及程度、年龄也不大合于规章。中学堂的学生大都是生员廪监，年龄自18岁至30岁不等，程度参差不齐；高等小学也存在秀才与学童同班学习的现象。至于教学方法，虽然章程中规定要注意“循循善诱之法”，纠正从前的死记、死背的学风，但实际上还是注入式的教学，“学生稍不留意，则教鞭随其后”。学堂的假期，除遵章放寒、暑假和例假以外，还就本地风俗规定了三个节假(清明节、上元节和中元节)，以便本地学生回家扫墓。

在教育制度方面，停废科举以前，新教育同旧科举并行，全省中等以上学堂的学生多是科举旧人，他们把学堂作为进身之阶，以求取功名、资格为目的。不少秀才入学堂就读，许多学生在毕业以后又参加科举考试，谋取科举功名。及至科举停废，法政学堂、大学堂、高等学堂以及府、州中学堂等毕业考试还仿照科举形式，毕业奖励又皆按照等级给予科举出身资格。由此可见，在新的教育制度中保留着浓厚的科举制度色彩。在教育内容方面，全省的各级学堂都特别注重经学的传授和旧礼教的陶冶。

初等小学堂5年，每周上课30小时，读经讲经为12小时，占全部课时五分之二；高等小学堂4年，每周上课36小时，读经讲经为12小时，占全部课时三分之一；中学堂每周上课36小时，读经讲经为9小时，占全部课时四分之一。另外，中小学堂每天还有半小时的“温经”时间。除经学而外，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的英语课程也十分繁重。如求是学堂，学生在修业的4年中，应修的课程为20门，英语类的课程就有15门，占四分之三。后来的中学堂英语学时虽有减少，但比重仍然不小。在学生管理方面，那时的安徽各学堂，依照清室颁布的《各级学堂管理通则》，在课堂及礼堂内悬挂《圣谕广训》，“每月朔望及孔子圣诞，由总办及教席率领全堂学生至讲堂内孔子神位(或万岁牌)前行三跪九叩首礼”，不准学生干预国家政治和学堂事务，不准“离经叛道”，不准妄发“狂言怪论”等等。并在各学科外，另立“品行”一门，考查评分，与各科分数合算。所谓优秀者，即予言语(口头)、名誉以至实物奖励；所谓恶劣者，则给予记过、禁假以至出堂(开除)的惩罚。而且罚多奖少，钳制甚严，这样势必激起学生的反感。1905年皖江中学堂所以发生苏、皖两籍学生驱逐教员的斗争，1908年徽州中学堂所以风潮迭起，都有管理方面的原因。至于女子教育，安徽在1906年以前寥寥无几，1906年2月安徽女子师范学堂成立，才有所谓女学。就是这样一所当时称为“条理秩然、功课亦佳”的学校，常年经费仅有英洋100元，学生也只有几个。1908年女子学堂虽增加16所，也仅限于师范和小学。

(三)学校的组织和师资

清末安徽学堂的负责人，最早称为驻堂总办。其后中等以上学堂一般称为监督，有的也叫总教习，小学堂称做堂长。学堂的监督或堂长，官立的多由官府任命；公立的一般是由邑绅、家族公推；私立的有的自任，有的聘请。高等和中等学堂的监督，多

是贡举以上出身，有些是达官名流及留学回国的学者。中等以上学堂，监督之下设有分管教务、训导工作的专职人员，称谓不一，或称学监、舍监，或称教务长、监察长，由监督延聘。

那时的教师，一般称做教习，有官府派遣的，也有学堂聘请的。由于学校方兴，师范初创，只得延用科举时代的举人、进士、贡生、秀才充任师资，所以普遍存在师资数量缺乏、质量不高的问题。这种状况，直到1908年也改变不大。据当年统计，全省23所中学共有教师183名。其中师范毕业的36人，占百分之二十；他科毕业的82人，占百分之四十四；未毕业、未入学堂的64人，占百分之三十五；外国人1人，占百分之零点五。这说明当时中学教师中还有不少老夫子，因而这个时期的教育还未脱离私塾、书院的形态。

(四)教育行政和教育经费

安徽在1903年以前，没有专门的教育行政机关，各府、州、县的学堂都由当地长官主持。直到1903年2月，才由安徽巡抚会同江苏巡抚奏准成立“两江学务处”，主管江西、江苏和安徽三省的学务。然而，这个跨省的教育机关很难适应，所以在1904年8月，安徽巡抚诚勋会同两江督抚（管辖苏、皖、赣三省）附片奏准，成立“安徽全省学务处”，经管全省各府、州、县官民所设学堂及留学生。从此，安徽有了独立的省教育行政组织。当时，学务处设总办2人，由藩、臬两司兼任；总办以下设提调1人，主持日常事务；提调以下设文案委员和支应委员各1人，分别掌握文书工作和经费开支。此外，还聘请参议4人，参加重要事件的商议。同年10月，支应委员张赞巽考察湖南等四省学务后，便草拟了安徽学务处章程，于次年10月经巡抚诚勋批准执行。这个章程，重新组织了学务处的内部机构，并鉴于当时学堂渐增，事务日繁的情况，加设额外差遣委员（相当于后来的督学）若干，“分

往各属调查，以凭考核整顿。”

1906年4月，清王朝明令裁撤学政，安徽也就废除了学务处，改设提学使司(相当于教育厅)。首任提学使是沈曾植，其后历任为陈启泰(按察使兼)、冯煦(布政使兼)、沈曾植、吴同甲、张其诜。同时，每州县设一劝学所(相当于教育局)，主持地方教育行政。劝学所以本地长官为监督，下设总董一员，由县视学兼任，综核各区之事务。州县劝学所逐渐设立。据统计，1906年为3所，1907年为34所，1908年为46所，至1909年全省达到52所。由于刚刚创立，人才缺乏，52个劝学所总董中，仅有师范毕业的5人，留学日本的1人；其余的除去资格不明的6人外，还有40人为廪生、贡生、举人、教谕、州同、州判、训导等出身。每县又划分若干区，每区设一劝学员(专职教育干部)。劝学员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本区筹款兴学事宜，承办上级交办事项，并调查学龄儿童，随时册记，挨户劝导，介绍送入学堂。

为了培养、提高教育干部，安徽在1908年4月，于提学使司附设“教育官练习所”，选聘精干教育者讲演，自提学使以下所有学务职员群聚讲习。到1910年，该所先后毕业75人，修业71人，其中年龄最大的67岁。

当时作为教育行政辅助机关的是教育会。安徽教育总会成立于1906年11月间。它是由士绅自由组织的专门研究教育的社会团体，会长是陆军部主事童挹芬，副会长是湖南永顺府知府吴传绮，有会员91人。后考虑到皖南、皖北情况不同，又于1907年、1908年先后成立皖北、皖南教育分会。皖北教育分会在省垣，正、副会长分别由湖北候补道李国棣、安庆府教授孙传澍担任，有会员75人；皖南教育分会驻江宁，由度支部主事吕祖翼、中书科中书胡璧成分别担任正、副会长，有会员67人。州、县也设教育会，但直至1909年才仅27所，还不及全省州县一半。

当时的学堂分官办、公办、民办三种，所以经费来源也是多渠道的。官办学堂的经费，一般由藩库划拨；公办学堂的经费，